

# 关于中国哲学发展圆圈的新探索

——评武汉大学等校新编《中国哲学史》教材

饶建国

恩格斯根据欧洲哲学的发展,总结出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直至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总的历史进程。列宁进一步按欧洲哲学发展的具体特点,划分了四个大的圆圈。

“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尔对伽桑狄〔斯宾诺莎?〕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①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②这是列宁所揭示的人类哲学认识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中国哲学的发展无疑地遵循着这个一般的规律,具有自己发展的圆圈。

教育部委托武大、中大、南开大学等九校新编的《中国哲学史》教材,一个显著的特色就在于努力贯彻列宁关于哲学发展的圆圈思想,依据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所固有的圆圈进行了论史结合的探索,取得了新的进展。

—

关于哲学史,黑格尔曾明确地指出,理念的具体运动,“并非象一条直线抽象地向着无穷发展,必须认着象一个圆圈那样,乃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这个圆圈又是许多圆圈所构成的……。”③把哲学史比作圆圈,这是“一个非常深刻而确切的比喻!”④黑格尔这一思想,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的重视和唯物辩证法地改造。

唯物辩证法所肯定的哲学发展圆圈,其实质含义无非是指人类的哲学认识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中上升的。那么,否定之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规律。”⑤客观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人类不可能一次完成对客观世界的真理性的认识,更不可能一次穷尽关于客观世界的一切真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样也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本身是矛盾的,人类的每一次认识无不包含着正确与错误,肯定与否定,否定之否定始终存在于这一过程之中。人类起初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简单的、抽象的、片面的、低级的,本身就有被否定的必然。后来的认识按着原来认识的必然性,使原来的认识趋于较复杂、具体、全面、高级,但本身又有被否定的必然。……”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一种方法把它消灭。”⑥辩证的否定就是既克服又保留,其本身应理解为发展。认识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从片面到全面,从低级到高级就是否定、发展。由认识问题的提出,经过许多认识的否定环节,到认识问题的解决,就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或阶段),就是一

个发展的圆圈，随着客观世界的矛盾发展，又有新的认识问题提出到新的认识问题解决。整个人类认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由认识问题的提出到认识问题解决的过程，近似于一串圆圈。这正如教材在《导言》中所概括的那样：“人类哲学认识的发展，充满了矛盾，经历着曲折，有其大体依存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思想起落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哲学认识，大体都有一个思想的起点和终点，由问题的提出、矛盾的展开、范畴的演变、争论的深入，到思想的总结，形成一个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进程由于它所反映的客观过程的矛盾性和反映过程本身的矛盾性，必然经历着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而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我们不应该把否定之否理解为简单的正反合三段式，更不应该把哲学发展本身所固有的圆圈，误解为是人们用主观的框架、来套在人类认识史之上。

## 二

教材的编者依据对哲学发展圆圈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解，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马克思方法论原则，一方面，坚持从历史事实出发，把中国哲学发展的生动的现实的历史过程作为哲学范畴的逻辑出发点、根据和基础；另一方面，善于透过历史的现象形态，摆脱某些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因素，从历史上具体的哲学矛盾运动中去发现其概念、范畴演化发展的逻辑进程及其理论上前后连贯的诸环节，因而，在探索中国哲学发展圆圈的工作中，不少地方具有独创见解。

翻开教材，首先使人感兴趣的是编者们探索了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一个大圆圈。咀嚼第一编，我国奴隶制时代（夏商周至战国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确实固有其逻辑线索。起源于大禹时代伟大治水斗争中的原始五行说和我们祖先在长期观察物象中提炼出的阴阳思想，标志着素朴唯物论和素朴辩证法已经萌芽，成为第一个哲学发展圆圈的逻辑起点。但是它们毕竟还是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初步认识，在理论上既没有提出和回答世界的本源问题，也未能深刻地说明客观物质世界是如何变化，为什么变化的问题。周太史史伯以其“和实生物”的矛盾统一论，伯阳甫以其“阴阳之序”的矛盾冲突论，发展了原始的阴阳五行思想。到史墨，提出“物生有两”“皆有陪贰”，把矛盾的对立提到宇宙观的高度加以论述，推进了素朴唯物辩证法的发展。继史墨之后，相继出现了儒、墨、道各家。孔丘重人的理性和能动作用，墨翟重感觉经验，各有其片面性而又对人类认识史作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他们在世界的本源及其发展的动力问题上，或如孔丘对鬼神存疑，却主张尽人事以待天命；或如墨翟提出非命、尚力，却又讲“天志”、“明鬼”。这都是对原始朴素的五行阴阳说的否定，构成了人类认识发展史上的必经环节。《老子》以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高度哲学概括，将以往的哲学范畴都纳入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成为其中一个个的环节。在天道观上，第一次提出“道”作为最高的哲学范畴，提出和回答了世界的本源问题，既否定了以往的天命天志，又克服了五材、五行说和六气、二气说的缺陷；在认识论上，开辟了“静观”“玄览”以识道的认识途径，既否定了墨翟的经验论，又注意到了以孔丘为代表的唯理论缺陷；在发展观上，总结了过去阴阳、常变思想及和同、一两之争，凝结成为“反者道之动”的朴素辩证法。《老子》哲学逻辑地标志这一时期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结。

恩格斯指出：“在思维的历史中，某种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实体和变体）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头脑中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的发展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关系一样”。<sup>⑦</sup>据此，我们认为，在历

史上出现的哲学体系应该是它以前哲学发展史的总结、“浓缩”。反过来说，哲学发展的历史与哲学家的哲学范畴体系是一致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每一种思想 = 整个人类思想发展的大圆圈（螺旋）上的一个圆圈。”<sup>⑧</sup>例如荀况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圆圈，它是百家争鸣哲学圆圈的“浓缩”。战国时期哲学发展圆圈，从早期稷下道家开其端，中经孟、庄、公孙、惠，直到荀况，首尾相应。庄周的齐万物，惠施的合同异，都是片面地强调（夸大）事物的联系而忽视事物的区别的相对主义；公孙龙的离坚白，韩非的析矛盾，都是一种片面强调（夸大）事物的区别对立而忽视事物的联系统一的绝对主义。荀况“兼陈万物而中悬衡”，既看到事物的区别，又强调事物的联系，如在天人关系问题上，先秦诸子们或主张“人与天地参”，以“诚”和“尽性”“赞天地之化育”，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或将“天”神秘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陷入“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况在批判总结先秦诸子的天人关系学说基础上，以“天道自然”“天行有常”作为自己哲学的逻辑出发点，展开“天人相分”、“人道能群”的哲学论证，最后归到“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结论，自成圆圈体系。荀况哲学本身反映了人类认识由片面到全面这一规律。

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探索中国哲学发展圆圈，必须强调下面两点：

第一，确定一种哲学体系究竟是哲学圆圈上的哪一个环节，应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加以考察。”<sup>⑨</sup>例如，战国末至秦汉初，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大转折。当他们在同奴隶主争统治地位时，他们就要求变革；但当他们逐渐取得统治地位时，他们就要求从政治上思想上实现集权和统一，坚持不变论。思想进程是这样的，反映在逻辑上就是辩证法走向形而上学。《易传》先讲“生生之谓易”，转而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最后讲“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实则是新兴地主阶级思想从战国末到秦汉初转化的逻辑反映。虽然《易传》不是出自某一个人之手，也不是产生于同一个年代，但是如果摆开这些繁杂的偶然性，在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对《易传》加以考察，可以断定，《易传》是战国末秦汉初的作品。因此，教材将其列在荀韩之后。

第二，必须紧紧追逐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以这一进程中的必然性统帅哲学史上的偶然性事实。针对以往形而上学哲学史家，黑格尔把全部哲学史看作是一个具有必然性的、合理性的、有次序的进程，这是非常正确的。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深藏在中国哲学文献所提供的自然线索之中，但是，按自然线索写下一切偶然性的哲学史事实，并不等揭示了中国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是对自然线索的高度升华和凝炼，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的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sup>⑩</sup>编写中国哲学史，必须排除与中国哲学发展必然性无关的即与哲学认识螺旋上升的必然性无关的（不能体现这个必然性的）偶然性事实。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上没有提出新的问题，又未超过他前面哲学家的认识水平，那么这个哲学家不应列入哲学史。反过来，如果这个哲学家超过了前人的水平，那就应该充分肯定其地位，并特别要将他的突出贡献作为重点写进哲学史。先秦哲学以荀况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识论为最高水平，以韩非和《易传》的矛盾观为最高成就。这就给两汉哲学家提出了难题，如果两汉哲学家没有在一些问题上超过先哲的水平，则就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无法占据地位。教材从贾谊的政论中筛选出辩证矛盾观，认为“贾谊在秦汉哲学史上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面向现实，对汉初复杂交错的社会矛盾能够作出比较全面而深刻的哲学分析。通过这种分析，他对客观社会矛盾运动作出朴素辩证法的概括，达到一定的理论深度，推进了先秦以来辩证矛盾观的发展”。

### 三

如何确定中国哲学圆圈的逻辑起点和终点？这实际上是个哲学史分期的问题。坚持哲学圆圈运动依存于社会矛盾运动，这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要求。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又告诉我们，哲学是一种远离社会经济基础的特殊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其发展具有自己内在的必然性。因此，我们认为，历史的自然分期（如朝代的更迭）甚至社会通史意义上的分期不能作为确定哲学圆圈起点和终点的依据，当然二者有可能出现吻合的现象。确定哲学发展圆圈的起点和终点的依据只能是哲学本身发展的逻辑进程的阶段性和这一阶段的内在必然性。

那么如何揭示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的阶段性和这一阶段的内在必然性呢？过去人们习惯于用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个对子来叙述哲学史。当然，从宏观来看，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表现为“朴素的唯物论——唯心论——现代唯物论”，“朴素的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辩证法”这样的圆圈运动。但是，仅仅抓住两个对子，是无法揭示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的阶段性和这一阶段的内在必然性的，并且往往犯简单化、公式化的毛病。因此，必须注重考察哲学范畴的矛盾发展和衍变。因为范畴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小阶段，是认识之网的网上纽带。（其实，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互相斗争和在斗争中的互相联结、渗透、转化，正是通过一些基本哲学范畴的继承、扬弃或赋予不同的解释表现出来。）我们只有将中国哲学史上出现的哲学概念和范畴，它们的涵义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由贫乏到丰富的发展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对立、依存和转化、前后递进的继承、扬弃关系都搞清楚了，才能把握住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的阶段性和这一阶段的内在必然性，才能确定哲学发展圆圈的逻辑起点和终点。

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发展，从董仲舒到刘禹锡，从周敦颐到王夫之，其逻辑进程似乎呈现两大阶段的必然性。例如从董仲舒到刘禹锡，曾有过西汉神学猖獗、魏晋玄学兴盛、南北朝隋唐佛教流行，只要我们对这一时期出现的哲学体系进行逻辑范畴的分析和阶级分析，剥掉它们的外在形式和特殊运用，就可以看出，无论是“三纲可求于天”，“名教”本之于“自然”，还是“贵贱”决定于“因果”，都是一种以歪曲或幻想的形式把社会压迫力量转化为超人间的异己力量，把地上的王权转化为天命神权。在荀况总结了先秦哲学的基础上，董仲舒重新提出“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的问题，把“天”神化为主宰力量，把“人”说成是可以承天道行事的道德实体，发挥出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成为前期封建社会哲学发展圆圈的逻辑起点。与之相对立，王充制定了“自然”“无为”“自生”“偶适”等哲学概念，试图以元气自然论来驳斥神学目的论。但他对“元气”的规定带有实物性，把一般和个别、本体和现象分为两截，自陷矛盾，不可避免地要被玄学唯心主义所战胜。玄学家们咀嚼“天人之际”的问题，而他们所展开的有无、本末、体用、动静、一多关系的论辩，则按其唯心主义思路，把“天”抽象化为“天道自然”，把“人”纳入社会化的“礼法名教”，论证了天道决定人事，名教合于自然。东晋以后，佛教与玄学合流，一方面是“俗谛”，其神秘的“因果法则”等于玄学的“天道自然”，而其理论基石“形神相异”的神不灭论，遭到了范缜有力否定；另一方面是“真谛”，用非有非无的“空”来标志世界的本体，利用“缘起论”“中道观”等给以貌似辩证法的论证，彻底抽空了世界的物质性，剥夺了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可能。要消除自董仲舒以来的神权宗教异化，必须以艰苦的哲学论证重新回答天人关系的问题。刘禹锡自觉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任务，首先，他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试图对无形之“空”作出唯物主义说明，指出“空者，形之希微者

也”。“无形”并不是“无物”，所谓“空”，就其体系来说，就是可能“以智而视”的“形之希微”之“物”，就其用来说，“必依于物而后形焉”是为“物”所固有的空间形式。这是对玄学和佛教空无本体论的积极否定，开始了哲学上由元气本原论向元气本体论发展的新阶段，启发了后世的张载等唯物主义思想家。接着，他第一次揭示了自然和人，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区别和联系，总结了荀况以来关于“天人关系”问题的认识成果，吸取了王充范缜等在这个问题上的失足教训，得出了“人之能胜乎天之实”在于“法制”的重要结论，且由此深入揭露了虚构神权的“阴陟之说”产生的社会根源，最后，以其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辉煌论证，回答了董仲舒提出的“天人相与之际”的“可畏”难题，逻辑地标志这一时期哲学发展圆圈在更高的思维水平上向荀况复归而告终。

人类认识的历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前一圆圈的终点可以是后一圆圈的起点，但不能成为经过一个圆圈后另一个新的圆圈的起点，但是在这个方面教材有些地方却给人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例如王夫之究竟是宋明理学的终结还是新的哲学启蒙的开端？似乎值得重新研讨。还有，中国近代社会哲学的发展是否构成一个圆圈，其起点在哪里，终点在何处，逻辑进程如何，具有哪些螺旋上升的否定环节，教材也没有给人以满意的回答。

#### 四

探索中国哲学发展所固有的圆圈，是一件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事情，它不仅能使我们进一步弄清掌握中国哲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充实唯物辩证法对人类哲学认识的概括，而且通过揭示中国哲学发展圆圈的内在逻辑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毛泽东的哲学贡献的时代意义，提高我们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

明清之际，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如马克思所说的“将要崩溃”但又未崩溃的“自我批判”的历史时代，哲学确实为这一时代演奏了“第一提琴”。这一时期许多优秀思想家们（诸如李贽、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等）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高歌入曲，以犀利的笔，直指向封建伦理本体化的宋明道学唯心主义，“伸斧钺于定论”，作出历史的判决。他们打破宋明道学唯心主义桎梏，发出了新的时代呼声，掀起了哲学启蒙思潮，构成了不同于封建社会后期哲学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这一早期哲学启蒙思潮在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清朝文化专制主义窒息之后，又成为近代哲学启蒙思潮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百日维新运动中激进派谭嗣同就曾经把早期思想启蒙赞为“昭苏天地”的“一声雷”，梁启超把自己时代思想变迁的原动力用一句话来包举，是“残明遗老思想之复活”，早期启蒙思想家们咀嚼并赋予新意的哲学范畴如道器、体用、常变、一两、虚实、知行等，在近代哲学中一直出现，至今还仍然活跃在人们的头脑之中。近三百年的中国哲学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发展的圆圈。我们想，如果揭示出这一过程的内在必然性，对于我们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生根、发展的思想土壤，对于我们认识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继承和变革意义，不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应该继续努力探索中国哲学发展所固有的圆圈。

注释：

①②⑧ 列宁，《哲学笔记》第411、271页。

③④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1—32页。

⑤⑥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38—139、139页。

⑦⑨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44—545、122页。